

全 面 解 读 一 生 不 容 错 过 的 古 典 名 著

·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

历史

下

小说

侯忠义 主编

解 读

《洪秀全演义》
《魏忠贤系列小说》
《英烈传》系列小说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全面解读——名家解过

013034563

1207.41

68

V3-3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历史

小说 下



解读

侯忠义 主编

《洪秀全演义》
《魏忠贤系列小说》
《英烈传》系列小说

1207.41

68

V3-3



北航 C1642192

辽宁教育出版社

013034283

©侯忠义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历史小说. 下 / 侯忠义主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82-9960-1

I. ①名… II. ①侯… III. ①历史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8520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 191 千字 印张: 11.5

印数: 1—5000 册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严中联

责任校对: 王 静

封面设计: 谭慧丽 张 瑞

版式设计: 王 萌

ISBN 978-7-5382-9960-1

定价: 22.50 元

目 录

解读《英烈传》系列小说	1
一 《英烈传》在讲史小说中的地位	2
二 《英烈传》的思想与艺术评析	12
三 《续英烈传》的承袭与突破	26
四 《英烈传》系列小说的影响	40
解读魏忠贤系列小说	49
一 众矢之的，文坛罕见	50
二 明宫迷雾，几个故事	52
三 魏客勾结，宫人遭劫	60
四 锄奸除邪，六君子赴难	64
五 株连种种，七直臣死节	71
六 欺压敲剥，民变处处	81
七 点点滴滴，世俗民情	87
八 人物刻画，颇具功力	94
九 归根结底，上梁不正	105
解读《洪秀全演义》	109
一 《洪秀全演义》的作者黄小配	110
二 太平天国革命的颂歌	141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历史小说(下)

解读《英烈传》系列小说

王星琦 袁华 著

本书在介绍、解读《英烈传》，分析其艺术成就的基础上，从小说与史实的关系及市民阶层的心态等方面，对历史小说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肯定了它在以小说反映当代历史方面的开拓意义和创造性的文学价值。

一 《英烈传》在讲史小说中的地位

在我国讲史小说史上,《三国演义》具有不可动摇的典范性。它产生之后,讲史小说创作沿着“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百川书志》卷六)的途径,创作益多。在众多的作品中,产生于明嘉靖年间的《英烈传》,一直受到小说史家的重视。那么,它是怎样的一部书?它在文学史和小说史上的地位又是如何呢?

(一) 《英烈传》产生的时代及郭勋其人

一部书的传与不传,情况真是复杂。有的书不传而传,它靠自己深刻的思想光芒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不胫而走,便是禁毁、封锁,也挡不住它那强有力的魅力;有的书传而不传,封建统治者竭力鼓吹,再三宣扬,或许能风光于一时,终因浪淘风化而湮没无闻。这两种情况的例证是不胜枚举的。也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与上述二端俱不相同。这就是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讲史小说《英烈传》。

一般认为,这部书是武定侯郭勋为标榜其先祖郭英的功绩,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而创作的,或是郭勋命其门人按照自己的意图而撰。然而,在我国汗牛充栋的讲史小说中,这部书居然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论思想艺术成就,这部书无甚高明之处;论普及历史知识之功,此作多因袭史书而拼拼凑凑。活泼不足,涩滞有余,且多有从狭隘的功利目的出发而篡改历史的情况。可它却在民间流传广泛而久远,文学史家和古典小说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它又较为重视,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有必要先来弄清楚郭勋其人。

郭勋,《明史》无传,其事迹散见于史书中的世纪、功臣世表及有关人的列传中。《明史·郭英传》后附郭勋事略。此外,明刊《皇明从信录》等书中亦有一些零星记载。戴不凡曾据以上资料对郭勋事迹作过钩稽(见《小说见闻录》),但舛误不少。近又有郑平昆氏作《〈英烈传〉作者考》(《明清小说研究》1991.1),述郭勋家世事迹,订正了戴氏的一些讹误。现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大致勾勒郭勋的生平事迹如下:

郭勋是明代开国功臣营国公郭英的六世孙。郭英(1337-1403年),凤阳人,郭兴(子兴)弟,18岁随其兄同事朱元璋,为朱亲信,“令置宿帐中”。

后因屡立战功，被封为武定侯。郭家与朱明王朝是亲上加亲的关系，真正称得上是至亲至密的皇亲国戚。按戴不凡的说法，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至少有四重：郭英的妹妹是朱元璋的妃子，即宁妃，《明史·郭英传》谓：“以宁妃故，恩宠尤渥。”这是第一重，也是最重要的一重。郭英的女儿又嫁朱元璋的儿子辽郢王为妃，这是第二重。郭英的大儿子娶的是朱元璋的女儿——永嘉公主，这是第三重。郭英的二儿子郭铭的女儿，嫁燕王世子（后即为仁宗），就是朱元璋的孙媳，亦即永乐帝的儿媳、洪熙皇帝的贵妃，这是第四重。郭铭子玠，因其姊为贵妃，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袭封武定侯。郭玠袭封洪熙、宣德、正统三朝，卒后因其子聪与郭珍（郭镇子，聪之堂兄弟）争袭，遂停嗣。天顺元年，郭珍子昌以诏恩得袭，郭昌卒，其子良承袭。正德二年（1507年）六月，郭良卒，其子勋于翌年三月袭封。《明史·郭英传》附郭勋事略中说：“勋桀黠有智数，颇涉书史。”又说：“自明兴以来，勋臣不与政事，唯勋以挟恩宠擅朝权，恣为奸慝。”可见郭勋是一个精于权术的人。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帝死后，因其无子，由他奶奶（成化皇后）指定，让正德的堂弟继位，就是嘉靖。当时，嘉靖皇帝尚在湖北，未及登基，正德帝的奶奶便命郭勋带领御林军卫戍京城。身为开国功臣之后，在关键时刻又立新功，郭勋当时确是权倾朝野的人物。嘉靖登基后，把郭勋和宰相夏言视为“股肱之臣”。这时，发生了明史上有名的一场朝廷政治斗争——“大礼仪”。什么是“大礼仪”呢？表面上看，是争名分，实质上是权力之争。古人十分重视宗法和祭祀，嘉靖要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内阁中的实权派多为正德旧臣，他们不同意嘉靖的做法。原因是兴献王是弘治帝的弟弟，未曾做过皇帝，故不能称“皇考”。嘉靖以子侄承伯父弘治之袭为帝，弘治才配称“考”。嘉靖对反对派臣僚的掣肘大光其火，许多人丢官、坐牢，或被拷打，即是所谓“廷杖”，前后有二百多人去职。在这场嘉靖派与正德派的残酷斗争中，郭勋坚决站在嘉靖一边，与张璁、严嵩结成一党，力主追尊兴献王为“考”。“大礼仪”争论三年，终于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于是，郭勋受到嘉靖的赏识和信任，不仅袭封为侯，更晋爵为“公”，称“翊国公加太师”，比他的老祖宗郭英的爵位还高一级。嘉靖十一年居然“摄事”，实际权力在大学士（宰相）之上，俨然一个“亚皇帝”。

如前文所说，郭勋是一个善于弄权术的人，在朝廷党争和派系斗争中，是很有实力的铁腕人物。权势益加，骄纵日长。郭勋在民间多行不法，“假威逞肆”，屡被弹劾，最后弄得连都察院也无法包庇他了，舆论大哗，无法平

息。嘉靖帝不得已才下令捕郭勋下狱。正德派老臣力主处勋绞刑，都被嘉靖压下去。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郭勋病死狱中。

关于郭勋以《英烈传》而为其祖郭英争得“配享”资格的情况，《皇明从信录》有明确记载。所谓“配享”，就是配享太庙，亦即将死者的神主牌放到皇家神牌一起去。营国公郭英的爵位是“公”，他的神主牌还没有资格挤到朱元璋的两侧或下方去，甚至连太庙也挤不进去。郭勋要设法使其祖挤进去，就动起了写小说树碑立传的主意，待造成舆论和影响之后，事情就好办了。郭家历来是以“好文”著称的，少不了有一帮文人门客和笔杆子帮闲。公侯爷好文，写小说却未必在行，因此，说《英烈传》是郭勋门人所为较为合乎情理，庶几可信。历史上的郭英，确是一员猛将，又救过朱元璋的命，可是历史上朱元璋与强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时，陈是被乱箭射中身亡的，并非像《英烈传》中所描写的那样，由郭英一箭定战局。朱元璋剿灭吴王张士诚，是大将军徐达生擒士诚，而《英烈传》却写成郭英俘虏了张士诚。这是朱元璋开国辟疆两次决定性的胜利，郭勋将大功统统归于自己的老祖宗郭英头上，使得后宫的帝后嫔妃们都相信《英烈传》的描写是确实的。乘此机会，郭勋上疏，要求将其祖郭英配享太庙，他终于达到了目的。《皇明从信录》卷三十记载：“丁酉，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进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庙。”五年之后，郭勋就死了。

郭勋其人其事，大略如此。至于戴不凡根据武定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臆断施耐庵实无其人，乃是郭勋所依托的说法，我们不敢苟同，且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故兹不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一部小说，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影响作用，致使郭勋身价有加，家族荣耀？

（二）历史和小说的关系

古往今来，开国之君和功臣英烈们，一向是人们所喜闻乐道、热情讴歌的对象，上自三皇五帝，下至朱元璋、努尔哈赤，无不如此。而那些功臣英烈们的发迹史更为人们所注目。一部二十四史，差不多也正是为这些胜利的王侯树碑立传的。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对于这些开国的元勋总是封侯加爵，或丹青于云台，或描绘于凌烟，或塑像于庙祀，以表彰他们开基立业之功德，忠孝节义之行为，使后人效仿他们，以为楷模。

《东观汉记》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光复汉室之后，曾下诏：“明设丹青之信，广开束手之路，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

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春，又征召丹青妙手，绘制邓禹、吴汉、岑彭、耿纯、耿弇、姚期等中兴汉室的二十八将的肖像，置于云台之上，以显其功。

《大唐新语·褒锡》：“贞观十七年，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郟公张亮、陈公侯君集、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世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及侯君集谋反伏诛，太宗与之决，流涕谓之曰：‘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云台二十八将图”和“凌烟阁功臣图”。可见，为开国英烈树像立赞，由来已久。尔后历代也多有类似之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眼中的明君贤臣不是凡夫俗子，而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来拯救社会普度众生的，故而一再地美化他们，神化他们，借以歌颂人们理想中的英雄。因此，一些小说家们也借此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塑造民众心中的明君贤臣的形象，叙述他们建立基业的发迹史。这一方面可借小说的形式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以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另一方面迎合了广大读者的心理，而达到小说创作“喻世”“警世”“醒世”的目的。

郭勋深谙上层统治阶级的心理，为朱明王朝开国君主树碑立传，也为自己先祖评功摆好，故撰《英烈传》，既能讨好于时下天子，又可以为自己抬高身价。当然，更重要的倒是在后者。郭勋又在“好文”的过程中，洞悉了通俗小说创作的一些规律和特点，如有意改变历史，将历史上某一人物的事迹移植到另一人物身上去，这在讲史小说创作中，是正常的情况，《三国演义》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又如明中叶以后，市民阶层对戏曲、小说中的发迹变泰故事有着特殊的兴趣，开国功臣建立功业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发迹变泰的过程，即由低微而高贵的过程。这样的故事情节，对于当时的一般读者，是很有吸引力的。《英烈传》付梓之后，或许有一段时间还是畅销书哩！

其实，我们抛开郭勋的人品不论，单纯从他对通俗文学的态度来看，他还真的是一位通俗文学的推波助澜者。与其说他好文，不如说他爱好和提倡通俗文学。着眼于此，郭勋在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特别是出版史上，无疑是一位有政绩的人。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将乱箭穿死陈友谅改为由郭英一箭射杀，将徐达擒得张士诚易作为郭英所俘虏，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讲史小说是小

说，而不是史事之实录。问题在于郭勋是郭英的六世孙，为祖争功、标榜自己家族和捞取政治资本之嫌的干系是逃脱不掉的。郭勋太熟悉小说的舆论作用和社会影响力了。不要说一般的读者，就连大文豪王渔洋也写什么落凤坡悼庞统之诗，为士人所嗤，“演义”小说之社会影响力不可谓不大。清人王侃说得好：

“《三国演义》所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忠义庙貌满天下，而有使其不安者，亦误于《演义》耳……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江州笔记》卷下）

关圣帝君，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中国的庙宇最多的怕要数关帝庙了，这是《三国演义》影响之大的一个有力注脚。王侃所说“士大夫据演义而为之文”，指的正是王渔洋题诗悼庞统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讲史小说的影响有时是大于史书的。这正是《英烈传》所以能为郭勋达到政治目的之深层原因。后宫的帝后嫔妃们信小说为事实毫不奇怪，嘉靖帝顺水推舟将郭英阑入“配享”行列则是一种综合力量的作用。郭勋就是这样，巧妙而迂回地为其祖争到了举足轻重的名分。

倘若我们仔细深究，历史并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不同阶级及其人们对历史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历史著作具有文学性，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左传》到《国语》《国策》，直至太史公的《史记》，都是明显的例证。钱钟书在《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考证》中说：

“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覘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

假使我们站在郭勋的立场上说话，不涉及他的为人及其他，只就小说创作而论，则几乎无法加责于他。郭英作战英勇，负过七十多次伤，移易到其身上的二功，虽非所为，于情于理却为其所可能为，为了集中塑造人物，将这种情理中的、符合人物性格和身份特点的行动，加以铺张、渲染和增润，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如果郭勋与郭英毫无关系，或者作品中那位功劳卓著的人不叫郭英，问题就简单得多了。然而，所有的假设毕竟是假设，表彰其祖的郭勋又显然是抱着明确的目的，这就使得问题复杂起来了。

古史与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之间微妙的关系，是难解难分的。钱钟书《管锥编》还说：

“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迂笔法相许，学士哂之。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

这个“同贯共规”说，很是耐人寻味。那种将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主要是历史小说、历史剧）截然分开来，以为它们之间秋毫不犯的认识，显然是片面的或绝对化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菲利普·巴格比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事件作出解释，是历史学家的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不过是给读者带来愉快。历史编纂终究是一门艺术，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某些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就曾是历史学家。”又说：“就其文学艺术家的角色说，历史学家并不把自己限定于仅仅以清晰、和谐的语言描述事实，相反，他从小说家和剧作家那里借用了许多窍门。为使读者欢悦，他强调异常的、有趣的事变。”（《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巴格比是从历史著作中看到了文学性和戏剧性，而逆转来看，在文学作品中也可见历史精神、风俗人情。更有趣的是，巴格比还引入德国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物理学家梅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来解释人们对历史的不同理解现象。他说：“只要他需要依赖别人的记述，历史学家就必须就这类问题作出假设：被描写事件的关联次序可能是怎样的，记录作者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动机来捏造、隐瞒、歪曲某种情况，等等。不用说，这些假设的确切性是可疑的，依赖于文件证据的历史研究的精确性，因此就更加减小了。”（同上）巴氏的观点未必都可取，但他关于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关系的论断，还是富于启发性的。

让我们再来假设一次——只是假设。乱箭射死陈友谅，乱箭中有没有郭英一箭——而这一箭又是致命的呢？徐达生擒张士诚，这一仗有无郭英的配合和协同作战呢？恐怕很难以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来回答，便是“测不准”了。

我们无意为郭勋辩解，只是想说明，简单地将《英烈传》看作是为博取地位名分而作，恐怕有嫌武断和轻率，问题要复杂得多。一部《英烈传》在民间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而且它还引出了很多后起的仿作，甚至可以说，在通俗小说史上形成了一个《英烈传》系列。说它是系列，并非指按时代演绎下去的一系列作品，而是指当代人写当代大事件模式的系列。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将详细谈到。

(三) 作品概貌

《英烈传》在艺术上的确是成就不高的，主要是见事不见人，叙写的事件多，描写却很粗略，缺少精微的细腻刻画，故人物的个性化特点就不突出。关于这一点，小说史家和研究者们早已指出过。如黄人就在《小说小话》中指出过：“书甚恶劣，尚不能出《东西汉演义》上，而托名天池，抑何可笑。”天池，就是徐渭（文长），黄氏意在抑《英烈传》，那么拙劣的东西，怎么能栽到徐文长头上去呢？

赵景深也说：“《英烈传》写得很坏。事实多而描写少，使人读来，并不比读正史省力多少。其病就在受了正史的束缚。作者想学《三国演义》，件件事还它一个根据，所以好些部分都与《明史》《元史》、陆燾《庚巳编》、杨循吉《吴中故语》、杨仪《明良记》和《高坡异纂》等书相合（详见钱静方《小说丛考》），因此不能逞其想象，结果成了与新闻纪事差不多的东西。”（《中国小说丛考》）

黄、赵二家所言，从总体上着眼，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嫌抑之过甚。应该说，《英烈传》中有些地方写得还是颇有情致的，并非一无是处。举例来说，如第三十九回《陈友谅鄱阳大战》中，写陈友谅被郭英射杀之后，朱元璋先是大喜，连连称赞郭英。及待旋师又入鄱阳湖时，内心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且看下面一段描写：

次日，太祖旋师，再入鄱阳湖里来，只见康郎山边，尸首交横，血肉狼藉，不觉泪下潸潸，对众将士说：“我当初从滁阳王起义，今日如此大战，幸得诸将成功，却不见了滁阳王；二来丁普郎等三十五人，并军士三百名，为我立功，一旦身死，忠臣义士，实可怜悯；三来友谅领雄兵六十万，与我交锋，为主者思量大位为天子，为臣者思量富贵作公侯，今者，一旦主死臣亡，三军覆没，尸骨山堆海积，血水汪洋，令我不忍目睹。”

如果我们对这段描写冠以“精彩”二字，恐怕不是溢美吧。大战之后，面对遍野横尸，作为一个胜利者，朱元璋这时的心情微妙而复杂。他想起了初从滁阳王举事以来，驰骋沙场，屡经战事，眼下滁阳王已不在人世，自然心中会升起无限凄伤。面对着陈尸旷野的自己的将士，他又岂能不痛心疾首，心绪黯然！最妙在对自己敌手陈友谅的“主死臣亡”，情绪则很微妙：有同情，也有悲伤。俗话说，兔死狐悲，作为一个人，一个有志得天下的人，面对血流成河的沙场，他同样也会为之动容的。若打了大胜仗，只是兴奋、欢

腾，恐怕就不那么真实，也不那么合情入理。兴奋、欢腾之余，心中又油然升起一缕惆怅和伤感，方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犹如在激昂高亢的乐章之后，一段舒缓而又略带哀伤的旋律，那就更加动人。当然，这段描写似脱胎于《三国演义》某些场面的描写，如曹操的横槊赋诗、诸葛亮五丈原临终前视察军营，都是一种艺术节奏上的匠心独运处，亦是表现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画龙点睛之笔。接下来，在这一回的末尾，写朱元璋梦见武当山北极真君，也颇有意趣：

太祖接应道：“今者友谅虽死，其子又立，本宜乘胜而往，但彼国士卒伤亡已多，一时穷迫，恐无完卵，于心惨然。进退正在犹豫，望神圣指教。”真君对说：“这也是劫数应该，何必过虑。”风过处拱手而别，却是睡中一梦。

面对穷寇累卵，要否乘胜追击，捣碎敌巢？在朱元璋头脑中打转。这正是对前文面对遍野尸横，万端慨叹描写的进一步点染，文心缜密，刻画精微。这样的笔墨，是颇具艺术感染力的。

又如，写郭英，也不是一味写他打胜仗，第二十七回“取樊岭招贤纳士”中，写郭英轻率强攻婺州城，结果兵折将损。书中写道：

郭英收了残兵来见太祖，太祖惊说：“行兵多年，尚然不识虚实，损威折士，罪过不小。”刘基向前说：“乞主公宽宥，待彼将功赎罪。”便密付一纸，递与郭英，说：“将军可乘今夜，再取婺州。”

后郭英按刘基之计，终克婺州。这样写，使得郭英性格更显丰富，也更具真实性。哪里有永远不败的常胜将军呢？即便是郭勋要美化其祖，美化得也很高明。若写郭英百战百胜，反不那么真实。忠勇中糅进一丝鲁莽，人物性格则更加鲜明。此外，写徐达因轻敌而被困牛塘谷，亦是明例。

指出一些《英烈传》中写得好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全书都写得很好。可惜，精彩动人之处在全书中毕竟不多。但以“很坏”、“恶劣”评价《英烈传》，似亦失之偏颇。

《英烈传》还有一个长处，即穿插了不少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在其中，增强了书的可读性，亦为一般读者所喜闻乐见。赵景深说“它组织了许多民间传说进去，这都是可喜的”。（《中国小说丛考》）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即第七十九回“唐之淳便殿见驾”中，写朱元璋断案一事。

刑官奏报说：“张校尉妻被卖菜王二所杀，邻人捉拿王二归案，蒙旨处王二抵命，”及上法场问斩，忽有一校尉叫道：“张妻系我所杀，不干王二

事，甘愿受刑就戮。”朱元璋心中疑惑，命召来重新审理。一一细问之后，来投案的校尉讲出了实情：原来此校尉与张校尉妻有奸情，日前五更时分，窥见张出门，遂潜入与张妻共寝。不意张又回转家中，校尉惶急中藏于床底。其妻问其夫何以复回，其夫说，天气甚寒，恐妻睡熟，特回来将被子为妻盖好。说罢为妻盖好被子，才又外出。躲在床下的校尉听了这番对话，思其夫对妻如此恩爱有加，而其妻竟水性杨花，有负丈夫，一时忿起，竟以佩刀杀死奸妇而去。王二晨起卖菜来到屋前，为邻人所疑，捉送到官。今王二临刑，人命关天，校尉不愿妄累无辜，大丈夫敢做敢当，故来出首就刑。朱元璋听罢，叹息数声，下断词曰：“杀一不义，生一无辜，尔亦义人也；张妻忍于背夫，罪当死。王二与你俱各赦罪。邻右妄累平民，更无实迹，法官可各答五十。”

这个故事虽带有较浓厚的封建礼教色彩，但在民间流传颇广。元杂剧中有佚名的《鲠直张千替杀妻》一剧，其本事可追至唐沈亚之的传奇《冯燕传》（《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基本情节均同。这个“替杀妻”的故事，赵景深《〈英烈传〉本事考》未曾道及，兹特为拈出。

我们知道，郭勋爱好戏曲小说，明宋懋澄《九籀集》卷十“鉴定”条：“世庙时，武定侯进《雍熙乐府》……”《雍熙乐府》可能即为郭勋所选编，至少是他在嘉靖间刻过。郭勋还刊刻过《太和记》，疑即《太和正音谱》。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太和记》：“然翊国公郭勋，亦刻有《太和传》。郭以科道聚劾，下镇抚司究问，寻奉世宗圣旨：勋曾赞大礼并刻《太和传》等劳，合释刑具，即问奏处分。夫刻书至与赞礼并称，似非传奇可知。”这里所说的《太和记》或《太和传》肯定不是戏曲剧本，沈德符的判断是对的。那与“大礼仪”并称，算作郭勋功劳的刻书只能是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朱权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世称宁献王。为皇室第一代封王刻书，自然是一大功劳了。郭勋自己（或使别人）将“替杀妻”故事插入《英烈传》，显然得力于他较为深厚的戏曲小说修养。

（四）书名小议

《英烈传》的书名，颇有探究的必要，因为“英烈”这个字眼人们理解不同，且关涉到小说的内容和体例诸问题。钱静方《小说丛考·英烈传》：

“‘英烈’二字，相传为明将花云而设。云，怀远人，貌伟而黑，骁勇绝伦，驻守太平。陈友谅以舟师来寇，云与元帅朱文逊、知府许瑗、院判王鼎

迎战，文逊战死，城陷，贼缚云，云奋身大呼，缚尽裂，起夺守者刀，杀五六人，骂曰：‘贼非吾主敌，盍趣降？’贼怒碎其首，缚诸樯，丛射之，骂贼不少变，至死声犹壮。瑗、鼎亦抗骂死。太祖即位，追封云东邱郡侯。方战急，妻郜氏挈三岁儿，泣语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义不独存，然不可使花氏无后，若等善抚之。’即赴水死……事见《明史》本传。演义因之，以其夫为英雄，妻为烈女，为从龙诸将之冠，故名其书为‘英烈’云。”

将“英烈”解释为英雄和烈女，似嫌过于拘泥。其实，“烈”恐不一定专指烈女，而是泛指战死的功臣烈士。观《英烈传》全书，花云只是诸英雄烈士之一，其妻郜氏只是在书中第二十九回中涉笔写到，描写文字并不比上文钱静方的引文多，且文字大略与史书同。万历刊本《云合奇踪》（即《英烈传》）卷首有徐如瀚序，序中说：“乃举英烈诸公溯其从来，摭其履历，演为通俗肤谈……”此“英烈诸公”之说，显然以“烈”指烈士了。此书又名《皇明开运英武传》，英武显指朱明王朝开国之英雄烈士，足见钱静方之说不足为训。

另外，此书称“传”，而不名其为演义，也值得玩味。写英雄群像，为英雄立传，近乎于英雄传奇，犹《水浒传》，非以史实为归，而以为群英立传为主。然而，它又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英雄传奇，一则史事较多，再则人物行动写实性强，少传奇色彩。故为讲史小说与英雄传奇之间过渡形态的东西。菲利普·巴格比说：“严格说，个人行为属于传记，而不是历史，因为这类行为涉及的不是众人，而仅仅是一个人，至多几个人。然而，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包容了许多有关君王、政治家、将军和其他重要人物的传记性细节。如果要问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总是回答说，这些个人的行为影响了众人，因而值得被看作历史。”（《文化：历史的投影》）

我国有史传文学的传统，与巴格比的说法暗合。在《英烈传》中，开基帝王及文武辅臣们的业绩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其将其看作是明代开国英烈们的合传，勿宁将其看作元明之交王朝陵替的历史。而且《英烈传》产生于《明史》之前，他依据的史料，只有明代中叶以前类似今天我们称作大事记或文件、回忆录之类，因此它又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至少它为《明史》的修撰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如第三十三回，写花云妻侍女孙氏救护花家独子花炜，写得细腻生动。《明史》卷二百八十九《忠义传》中花云本传所叙与《英烈传》全同，只是文字上简约得多。这恐怕也是人们看重《英烈传》的原因之一。

总之，对《英烈传》的评价，不可以偏概全，要从多方面去考察，又要作细致分析。相对来看郑振铎先生的论断较为实事求是，他说：“《英烈传》写朱元璋得天下事，把这位流氓皇帝的‘发迹变泰’的故事，烘染得很活泼。”（《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即是说，《英烈传》写得并非“很坏”、“恶劣”，它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刘大杰先生在指出了《英烈传》“文笔则甚庸弱”之后，认为“此书在讲史中虽非佳作，但影响很大，戏剧、评话多取为题材”（《中国文学发展史》）。亦颇客观。这些评价，均可供我们在阅读欣赏和分析研究中参考。

二 《英烈传》的思想与艺术评析

《英烈传》曾题为《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英烈传》《云合奇踪》等名，是继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又一部长篇讲史章回小说。它仿《三国演义》“七真三假”的创作手法，既依据史书，又博采杂著、野史及民间传说，叙述了以明太祖朱元璋为核心及其他“开明武烈”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英烈传》反映了当时激剧动荡的社会现实，也可以说它是写了一部明朝的开国史。这部讲史章回小说，以史事为经，以人物为纬，塑造了一大批开国英烈的形象，描写了众多令人触目的战争场面，故而鲁迅先生赞许道：“叙一故事而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水浒》即其一，后出者尤多，较显者有《皇明英烈传》，一名《云合奇踪》，武定侯郭勋家所传，记明开国武烈，而特扬其先祖郭英之功。”（《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鲁迅先生所以重视这部书，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它代表了讲史小说中的一种模式。它的影响颇大，以至和它的成就并不成正比。

（一）关于版本

《英烈传》自问世于明代嘉靖年间以来，屡经翻刻，且多次更改书名重加编次，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仅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著录的版本就有十种，而此后经人考订出的亦有五六种之多，现择其主要的略述如下：

《英烈传》，“今所见的明本有三本，书名卷数不同，实一书”（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别题《皇明英武传》，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目，共六十回，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刊。卷一题“原版南京齐府刊行”，“书林明峰杨氏重梓”，